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43  
14 July 1976  
CHINESE

第一九四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芬奇先生	(意大利)
理事国： 贝宁	博亚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海恩斯先生
日本	安培勋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米尔孔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斯塔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毛里求斯总统就以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发动“侵略行为”提出控诉

- (a)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非洲统一组织驻联合国助理执行秘书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12126 )
- (b)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毛里塔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12128 )
- (c)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S/12123 )
- (d) 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12124 )

主席：按照理事会前数次会议的决定，并且在理事会的同意下，我提议邀请乌干达、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卡塔尔、肯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几内亚、索马里、南斯拉夫和印度的代表参加理事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毛里求斯代表哈罗德·沃尔特爵士；乌干达代表阿卜达拉先生；和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维希马尔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肯尼亚代表维亚希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南斯拉夫代表穆耶什诺维奇先生；和印度代表贾伯尔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此外，我还收到古巴代表的来信，要求参加安理会当前议程项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理事会暂行

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在安理会的同意下，我提议邀请古巴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邀请古巴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通常的了解，即在轮到他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就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古巴代表阿科斯塔·罗德格里斯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愿首先同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一道，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对丧失一位杰出的国家领袖古斯塔夫·海涅曼博士表示诚挚的慰问。海涅曼博士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四年间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总统，是国际上的杰出人物。

今天是七月十四日，我愿在此向法国代表团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之意。法国传统上是自由的守护者，我们希望它能同我们一道携手为世界的进步、自由、正义而战斗，摧毁世界上阻止人类走向正义和繁荣的国际社会的那些精神上或实体上的其他许多“巴士底监狱”。

我不预备讨论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所发生的事件的细节。安理会已经从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元帅阁下的信中得到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全部情报。此外，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星期五，乌干达外交部长阁下在他对安理会的发言中也对这个史无前例的罪行作了详尽的描述。而且，毛里求斯外交部长阁下以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现任主席的身分，毛里塔尼亚常驻代表以非洲集团主席的身分，和卡塔尔大使以阿拉伯集团主席的身分都对这个不幸事件作了补充。

我们知道，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阿明总统从恩德培机场控制塔接到消息，一架载有250位旅客的被劫持飞机，仅余15分钟的燃料，要求准许降落。乌干达

总统和人民因而处于一个微妙进退两难的局面——是拒不准许飞机降落，从而使旅客有被杀害的危险；还是准许飞机在恩德培降落，并承受劫持的后果。

乌干达总统基于人道上的考虑，他的责任感和应法国的要求，准许了飞机降落。随后，阿明总统作了诚挚而不懈的努力，在这个微妙而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帮助那些人质，尽其能力从事救助。这是那些人质、法国当局和被劫持的飞机上的机组人员都可以证实的事。阿明总统为了让那些人质获得食物和点心而与劫持者联络。

乌干达当局本来的意思是想供给飞机食物和燃料，使它能飞到别处。但是，劫持者拒绝飞往他处。乌干达当局为了要保证人质的安全而急切地与劫持者合作。

如同以前乌干达外交部长所解释的，劫持者在战略性地点都放置了炸药，他们要求乌干达的保安部队撤到离开机场终点站大楼 200 米以外的地方。劫持者不准乌干达部队走近大楼。我们乌干达兄弟除了接受劫持者的要求之外别无他法。

此外，那些人质还得到了医疗、食物和其他必要的服务和供应。法国的机组人员以及许多人质都证实了这个事实，尤其是关于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医疗队，这个队向需要医务照料的人质提供了服务。

由于阿明总统的努力和说服能力，许多人质都获得释放，尤其是具有以色列以外国籍的或双重国籍的人质。阿明总统时常访问那些人质，向他们保证他会以孜孜不倦的努力来争取他们的释放。他从许多政府和人质本人方面收到了许多电文，感谢他基于人道立场的诚挚努力。

在这同时，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公开宣布与劫持者谈判的意愿。上星期五，法国代表向安全理事会证实，以色列当局曾同他的政府联络，表示有意谈判，并邀请法国政府充当中间人。

但是，在这同时，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正在计划向乌干达进行肆意的侵略。他们正在研订计划并预演袭击行动。其实，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开始就准备袭击乌干达，利用这次劫持作为借口。很明显，以色列政府从开始就决定要袭击乌干达，因为它从来没有放过英勇的乌干达人民和政府。政府在非洲揭开以色列丑恶的咀脸和揭穿它与南非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勾结。

拉宾先生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对以色列议会讲话时就暴露了这个策略：

“以色列国防部队和情报机构在设想、规划和准备上没有浪费任何必要的时间。”但是，在这个声明的前三天，以色列的外交部长曾在议会中说：

“据我们获得的消息，所有的人质都平安无事。”

如我前面所提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企图以这种劫持行为来辩解它的侵略。它企图以营救行动来掩饰其赤裸裸的侵略，以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动机来作为辩解理由，这都是徒劳的。它企图指控乌干达总统，毁坏他和他国家的名誉，声称他预先与劫持者合作。

犹太复国主义者用他们惯常的传统伎俩——指控、捏造、谎言——来掩饰他们脆弱的论点和阴险的计谋。他们嘈杂的宣传受到他们的保护者、盟邦和喽罗的支持，也受到西方具有强有力的偏见的大众传播工具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报纸的支持。

虽然这明明是对本组织的一个主权会员国公然的侵略、是一个背叛性、不诚实和严重的罪行、犹太复国主义者却白费力气地想转移国际社会对这个侵略的注意力。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了我们的乌干达兄弟和其他人等，包括劫持者的好意，使他们相信了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话。甚至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的《纽约时报》上都说：

“……707号飞机告诉恩德培控制塔，赫克尔里斯飞机上载着劫持者所要求与人质交换的被监禁的游击队员。”

犹太复国主义者向全世界宣布他们愿意谈判；但是，他们却拿着武器来到谈判的地点。以前，人们是相信他们的话的，但是，他们的罪恶历史清楚地证明，犹太复国主义匪帮根本不知道廉耻为何物。

为了为这种丑恶的侵略行径辩护，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但想尽办法去诋毁乌干达及其总统，同时，也想尽办法使人们对巴解组织——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的行为发生怀疑，然而，这都是枉费心机的。

国际社会都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一开始就谴责这种劫机行为，并且派了一名显要的代表到坎帕拉，参与同劫机者的谈判。

甚至以色列的支持者，甚至美国，也曾经感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帮助美国公民撤出世界其他地区。

但是，由于劫机者不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控制，他们拒绝了巴解组织的提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一个严肃的、诚实的和高尚的民族解放运动，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企图破坏它的真正形象是徒劳的。

以色列的肆意侵略是违反国际法及其公认的规则与准则的严重罪行；是蔑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也构成了违背诚意谈判的原则的危险先例。

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犯下的罪行无助于和平的事业，也不会解决劫持飞机或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因为，国际恐怖主义是不能由国家恐怖主义来解决的。

我不想长篇大论地引述丰富的法律文献来支持我在这方面的说法；我只想提请安理会注意载于法国《世界报》一篇非常重要和中肯的文章——《世界报》是世界闻名的有地位的报纸，因此，它不可能被指责为反犹太或支持阿拉伯的报纸。

毛里塔尼亚外交部长阁下昨天已引述了这篇重要文章的一部分，文章的作者是让·施韦贝尔先生。今天，我要多引几段，请允许我用法文把它们读出来。七月九日《世界报》说：

“《联合国宪章》没有想到恐怖主义和劫持人质所引起的问题，但是，联合国会员国是受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所约束的。这些原则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任何国家都不应代行正义、或干涉别国的事务；各国在任何冲突中都应采取和平解决办法，必要时，诉诸安理会。

“同过去的国际法比起来，承认这些原则是一大进步，因为，过去的国际法只希望保证大国之间的勉强平衡。承认这些原则，为小国提供了相当程度的有效保护，使大国为了避免显然是自取灭亡的新战争，不得不遵守一些共同的规则，甚至接受联合国一定程度的控制。”

文章继续说：

“……竟然没有一个西方的领导人对于这种暴力行径表示最起码的保留，这即使不是令人感到不安，也是令人感到震惊的。这种暴力行径无疑违背了《宪章》把“强权即公理”的原则带回到国际关系中去。

“国家保护其国民的权利——有些法学家称这种权利为“人道保护”——被用来为侵犯乌干达主权的行动辩护。然而，让每一个国家自己去决定这种权利，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各会员国的承诺，同时也是极端危险的。而且是忘记了法国外交官尚在进行谈判，并且已经产生了显著的结果；当以色列对恩德培进行偷袭时，巴黎当局曾经说谈判并没有中断。法国受有关各国所托，一心想使谈判成功，即使谈判失败，也要找出失败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以色列人指控乌干达国家元首串通劫机的恐怖主义者，我们要看一下在安理会上他们如何为这种指控找出理由……”。

让·施韦贝尔先生继续说：

“但是，他们要找到明确的证据来证实他们的指控是不容易的。虽然，阿明元帅同恐怖主义者有道义上的瓜葛未始不可能，但是，凡事都是非常谨慎的。对他有利的证据不少——特别是法国外交官曾指出，乌干达国家元首亲自向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援助。还有一些人质说，他们感谢乌干达国家元首使他们在恩德培的日子好过一点。”

《世界报》继续说：

“……以色列对恩德培的偷袭还构成一个严重的危险：日后同样的行动也可能有理了……”。

文章又称：

“难道，我们应该承认“人道保护”的权利只属于军力强大的国家，而这种权利又只能向弱小国家行使吗？无论怎样，假如一架被恐怖主义者劫持的载有以色列人的飞机降落在希波机场或奥利机场，很难想象以色列会在阿姆斯特丹或巴黎采取同样的行动。加拿大外交部长坦率地承认，倘使恐怖主义者在加拿

大境内活动，加拿大将不允许外国的干涉。”  
他是对的。

“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就转而弱肉强食，蔑视国际法，漠视小国甚至黑人国家的主权，有此必要吗？因为，以色列的这种行动悍然侵犯了乌干达的主权。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自毛里塔尼亚回来以后发表的谈话也是这个意思……”

“《世界报》又说：过去，人道保护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用来为大国的所谓炮舰外交辩护。在这种政策下，大国以保障和捍卫国民的安全和权益为名，向全世界行殖民统治之实。罗得西亚和南非听到以色列偷袭成功的消息后额手称庆，他们并没有高兴错。它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它们的希望：西方国家从此恢复了它的使命感，最后还是充分利用了它的军事优势，终将决定一举而消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的呼声——西方国家认为这是胡闹——以及这些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联合国的支配地位。”

劫机者一般都属于有政治动机的团体，因此，他们的目标有时是极端理想主义的。近年来，尽管劫机者的行为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多么引起争议，可是他们已表现出相信别人的话，并且愿意谈判。以色列的罪行将使劫机者越来越不信任别人的话，也不相信有谈判和妥协的可能性。最为肯定的是，世界今后碰到的劫机者将是更加愤世嫉俗、更加小心防范，劫机问题和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将永远无以解决。

为了证明我的说法，我再次引述七月十一日《纽约时报》的文章。这篇文章描述在恩德培发生的事情：

“同守卫机场大厦的劫机者互相开火，为时极短，但极猛烈。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余的显然都被击毙于机场大厦之外。只有那个叫鲍赛的德国人，拿着机关枪跑进了里面。”

“在那极为恐怖的几秒钟内，鲍赛扫了一眼那些匍伏在他面前的人质。当时他只要扳一下枪机，就可以杀死很多人。但是，据哈尔杜夫先生说，他迟疑了一下，然后高声叫道：‘退后，扒下’，把枪口转向逼近的以色列士兵。”



不过一分钟，他就死于以色列士兵的乱枪之下。

“哈尔杜夫先生说：‘当我看出他不开枪打死我们时，我真的不能相信我的眼睛’。”

我也要大家注意一下非常重要的枝节问题。以色列的攻击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被释放的人质所提供的情报，这非常危险，因为，劫机者将来会记取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想一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如我所说的，以色列对乌干达的攻击不会终止劫机事件，也不会解决劫机问题。

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真要感谢以色列黑手党，因为，我们这才知道打仗不是儿戏。我们也要感谢他们，我们现在看清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诺言、保证和谈判究竟有什么价值。现在，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和以色列的谈判观念。当他们到联合国来要求同阿拉伯谈判时，他们是怀着险毒的用心的。

我刚才已说过，前几位发言人曾谈到这个悲剧的许多方面，我也不用细说了，但是，我要谈一些我国代表团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当以色列侵略的消息传开以后，西方国家和它们的宣传机构以及帝国主义集团欢欣若狂，全世界是有目共睹的。它们歇斯底里地为罪行喝采，为侵略欢呼。一个超级大国打电报支持和祝贺犹太复国主义者取得这样的“成就”。这个超级大国还未收到恩德培事件的全部详情就向以色列道贺了。它的电台，美国之声，在事件发生后几分钟就广播了这则侵略新闻。这个国家的反应，我们是料到的，它一向支持以色列，无限制地和不正义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不正义事业。正是这个国家，它往往敌视阿拉伯和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以及在巴勒斯坦或南部非洲对抗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这种支持以色列、敌视非洲和阿拉伯人民的行为，是最近在安理会上投否决票反对接纳独立的非洲安哥拉国家之后又一次新的表现。

我们也注意到，西方国家，特别是联合王国和西德，对以色列的侵略普遍感到欣慰。至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反应，我要引述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世界报》该报说：

“白人政权的支持者欢欣雀跃。

“南非总理沃斯特先生在以色列偷袭乌干达后于七月五日星期一致电拉宾先生祝贺。若干南非社团也打电报给耶路撒冷政府表示支持。

“以色列偷袭的成功，使南非白人欣慰，他们心想，黑非洲的军队要是没有外来的援助，是不能打的，很容易被技术高和冲劲大的白人军队所征服”。

《世界报》继续说：

“南非军方深信，保卫白非洲，免于黑非洲的侵犯，是很容易的。他们说，除非有苏联这样的大国介入，提供大量的武器或派遣军队和指导员，不然的话，是不用担心的。”

恩德培悲剧真正暴露了许多令人困扰的、危险的和严重的事情。它暴露了许多危机和严重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仍然影响着西方的统治集团和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我要请大家注意下列几点：

首先，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的少数白人殖民表现了种族主义的和狂热的支持。对他们来说，以色列的侵略只不过证明，白人对非洲黑人和阿拉伯棕人——对另一个敌对世界的，也就是阿非大家庭的黑人和棕人——进行了一个高度成功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雀跃反映出它们对技术效率和技术成就的着迷——甚至不惜牺牲礼貌、诚实、荣誉和道德原则。以色列的攻击使欧洲重温起殖民主义的旧梦。欧洲有一些报纸和电视认为这是欧洲昔日雄风的重现，恋旧地想起了欧洲的黄金时代。

第二，肯定了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作风：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该区域的利益充当走狗和保镖。以色列希望西方国家允许它在我们区域扮演警察的角色，以便同南非和罗德西亚种族主义白人政权勾结，控制非洲和阿拉伯的人民和资源。历史的事实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自愿地在我们土地上充当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利益的仆从。

第三，以色列这次侵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打击非洲人的士气，打击阿拉伯人的士气，要在他们之间促成分裂，要他们相信他们在巴勒斯坦或南非对抗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白人殖民的斗争是不会有结果的。他们想要我们相信，集中心力对抗白

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是毫无希望的，是要注定失败的，而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重新顺从我们的旧主子。这方面，七月十一日《曼彻斯特卫报周刊》写道：

“…整个非洲…也一定有一种军事上空虚的新感觉。如果三架从天而降的以色列飞机就可以摧毁停机坪上乌干达半数昂贵的米格机，击溃一支防卫森严的部队，那就等于戳穿了非洲武力的伪装。请问，卢萨卡·达累斯萨拉姆或内罗毕在受到突击时，又有多安全呢？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对例如南部非洲危机的看法又会怎样改变呢？”

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条标题一语道破：“以色列偷袭；显示非洲国家无能为力。”

第四，以色列的侵略突出了一个超级大国支持一个象犹太复国主义集团的侵略性和种族主义政权时的危险性。这次侵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美国的飞机，美国的精密装备，美国的技术和专门知识，还有美国的怂恿和庇护。我们知道，美国法律规定给予或卖给外国政府的武器不得作内部安全或自卫以外的用途。我要借这个机会指出，即使是美国报章，也不能忽略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的尴尬面。

今天，《华盛顿邮报》写道：

“国务院已确定，以色列突击队七月三日至四日对乌干达进行惊人的突击时使用美国制C-130军机，“不违背”美国法律。

“没有人对这个结论感到意外，特别是事先福特总统很快地赞扬了以色列拯救103名拘留在乌干达机场的人质。美国官员承认，国务院这个结论，以及美国在联合国里对突袭问题的坚定立场，其重要性是可能从此创了一个先例。

“就美国的武器销售法来说，国务院实际上是对于当初附有法律条件售给以色列的武器这次有问题的使用，作了一个迅速的解脱。这个法律规定，这些武器只能用于内部安全、自卫、区域防卫或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措施。

“国务院认为，以色列在乌干达使用三架美国C-130运输机是用于“合法自卫”，根据外国军事销售法，这是容许的。这是自卫一词的不寻常用法，因为，袭击行动发生在离以色列领土2,500哩的地方。

“美国官员承认，美国星期一在安理会提出的法律解释更加新奇。”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受到的良心谴责。

犹太复国主义集团从其占领的巴勒斯坦飞到非洲，是为了自卫或内部安全吗？我们要美国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们知道，我们的呼吁，我们提出的问题，美国是一向不理的。我们不期望有任何答复，特别是在这个大选年，因为，这个时候，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美国政客的政治生命是握有生杀大权的。

但是，我们仍然要向美国人民呼吁，提出我们合理的问题。假以时日，伟大的美国人民将会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美国及美国基本利益的阴谋。美国人民总有一天会发现，美国这样无限度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集团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灾难。

我们对人民仍然有信心，我们对人民不会失望。我们是同美国统治集团吵架，同左右美国政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复国主义匪帮吵架。

现在，我要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

有一件事实在很令人难过。威廉·斯克兰顿州长承认乌干达的领土完整受到了侵犯，而这种侵犯“按照联合国宪章是不容许的”（第一九四一次会议英文本第31页）。但是，他却欢呼以色列的侵略，是

“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拯救任务之一，其勇敢机智空前罕有。世界各地无数的人惊叹不已，我承认我也是其中之一。”（同上，第38—40页）。

我们的同事斯克兰顿州长的这种表白，使我感到痛惜。他竟然作出这样感情用事和文不对题的反应，我感到遗憾；他的文质彬彬和优雅风度是我们所一贯赞赏的。我承认，在我们一起在安理会工作的期间，我们大家都非常尊敬斯克兰顿州长，他忠于美国，虽然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我们同他和他的政府有不同的看法。对他说的这些话，我表示失望和惊讶。不过，要是我们从仍然存在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种族心理，如果不是种族主义，来看待恩德培的罪恶攻击所激起的这番不合理的感情冲动的话，也许会找到对于这种反应的解释。

主席：名单上开列的下一位发言人是法国代表。在请他发言之前，我愿借这个机会代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并代表我国代表团为法国国庆日向他表示最热烈的庆贺。

七月十四日是人民争取自由和确认人权的历史上具有深长意义的日子，我认为在这次辩论提到这一天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辩论的过程中人民的独立和主权以及基本人权等问题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勒孔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对我国的赞扬的话。我认为你对激起七月十四日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的那些理想说得非常透彻，因而我对于你所说的话已经没有可以补充的了。唯有表示，即使这是我国的国庆日，愿对我们的工作作出我的贡献。

首先我国代表团愿在这里就古斯塔夫·海涅曼总统的逝世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表示吊唁。海涅曼博士曾是蓬皮杜总统的同事和朋友，他对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起过重大的作用，法国对于他的远大眼光、政治勇气和绝对忠诚确实非常敬佩。我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刚刚遭受的痛苦损失，觉得就象我们自己的损失一样。我本人很荣幸地曾经认识古斯塔夫·海涅曼博士。我很钦佩他的具有人类温暖感情的处事方法，因而我愿在我国代表团所表示的吊唁之外，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吊唁。

由于它的悲惨后果，飞行特拉维夫和巴黎间航线法国空中巴士的被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表明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严重危机之一。因此，法国代表团虽然有种理由对这一事件在法国和其他地方所引起的愤慨表示同情，却认为我们应当不感情用事尽可能在各项原则的范围内审查这个事件。

我国代表团业已提出关于事件经过的详细说明。因此，除了回顾直到狂暴的结局为止前后发生的各项事实使人难以判明责任之外，没有必要再来检查这些事实。但由于我们应当答复理事会中所提出的问题——纵使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隐蔽了真正的问题——我仅就这一点简单地提出一些意见。

让我们先说几个非洲国家控诉的对象以色列。乍看起来，为了以暴力达到一个目的，一支武装部队突袭外国机场，的确构成对国际法的违犯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为了作出客观的判断，我们应当考虑到导致这项行动的环境。显然，如果无辜人士的生命和安全事先未受到不法的威胁，这个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以色列的干预具有这样的目的和效果，那就是使一些以色列公民获得自由，因为这些以色列公

民同法国公民一道当时都受到最可恶的勒索，受害者当时不仅受到立即死亡的威胁，而且对于任意决定的事件和因素也丝毫没有影响力可言，这些因素一旦发生作用，就会决定他们的生死。

有些人说以色列的行动是不必要的，因为同劫持者的谈判快要到成功的时候。但是，除了在事件发生之后不可能确定这种乐观看法是有理由的之外，应当了解这种想法是默认勒索为合法，因为只是由于勒索的关系才使不属于国际法上任何已知门类的一方参加谈判。

这些考虑说明要把以色列所采取的行动定为那一类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对乌干达主权有所侵犯的话，它并不是侵犯该国的领土完整或独立，而是完全为了拯救受危害的人命，并且是在一种极为特殊和特别的情况下进行。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通过的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附件第二条，该条论及什么是“显见的”侵略行为，并且说可以“根据其他有关情况”来对侵略行为加以论断。

对乌干达的行为作一论断也是同样困难。乌干达于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签署的海牙公约第九条规定：一 航空器已被劫持或即将被劫持时，“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将航空器交还给合法机长控制，或维护他对航空器的控制。”但谁能因为乌干达曾经首先想到乘客和机员们的生命，曾经采取确保他们安全的措施，给予他们最低限度的舒适，并协助使他们多数获得自由而对乌干达加以谴责？即令这种行为最后或许会使满足劫机者的非法要求一事有发生的可能？

我在第一次的发言中曾把乌干达政府采取决定以后的事件作了清晰的说明。我曾叙述从那个时候起以及在当时我们所知的事实方面乌干达当局和劫机者之间所建立的关系。

这个事件所引起的关切应该作进一步的调查吗？的确，如果我们只谈涉及恩德培这个戏剧性事件的国家的责任问题，我们不认为这种措施会提供更明白的答案。这种关切，这种困难是由于这些国家虽然明白表示反对，但却为由同一罪恶——空中劫持并扣留人质——所引起的一连串无情的事件的后果连在一起。

就这一方面来说这个事件是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为实现他们的罪恶意图而发动事件的一群人，不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会对国际关系影响到什么程度。那些不是国际法主体的人最初对并不代表任何方面的人所犯的暴力行为导致一连串的不正当和非法事件，而这一次的行动竟是国家的作为，终于造成另一暴力行为。这一连串事件的后果就人命伤亡，对人质和他们的家庭所造成的痛苦，和物质的损坏来说，或者就破坏国际关系中为和平的必须的安定和信心来说都是可叹的。

当然干出这些行为的人会说，他们是为奉献于一项事业而发动斗争，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源，他们以他们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发动战争，企图以最低的代价达到最好的成果。以这种动机为借口是一点也站不住脚的。除了没有任何主管当局来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的行动是否合法之外，动机的性质是不能作为诉诸这种手段的理由。国际社会对消除战争有缓慢的进展；它不能容许任何集团为了奉献于它们的事业而诉诸远为令人厌恶的手段，因为这些手段只是危害无辜的生命。而且，有些暴力的方式实际上是对他们所要服务的事业有害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一开始便不承认劫持空中巴士者的行动，是由于对巴勒斯坦人的真正利益具有正确认识的关系。

法国不论在什么地方从不忘记需要根据三个原则谈判解决中东问题，这三个原则是从占领领土撤退，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一个祖国的权利以及在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有在安全、公认和保证的疆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不幸的是双方这种暴力行为制造了新的摩擦、怀疑和怨恨，并不使这种必要的解决办法更容易实现。

我国对于任何地区发生的暴乱都表示痛惜。今天它对不幸造成双方死亡的悲剧也感到痛心。法国也非常关切这种悲剧对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后果，因为象刚刚发生的这一事件就使大家在拯救人命和尊重国家主权之间面临一项抉择。如果我们要从恩德培的悲剧中获得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以谈判方式使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得到确认。由飞机运载的无辜人士的生存权利不是无足轻重的；它是显然的，也是神圣的。在这方面象在其它方面一样，越来越迫切需要寻求能使各国就这件事共同合作的办法。

主席：既然除了安理会现任主席意大利以外，所有会员国都就审议事项发了言，我现在按照一般惯例，以意大利代表团的名义发言。

首先我要承认，当我开始要在这个辩论中发言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矛盾和深感忧虑。坐在主席的位上，作安理会理事国中的最后一个发言者——我真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好是坏——不能不感到辩论中的每一次发言都有强劲的感情暗流。我觉得自己很难完全推卸当主席的种种责任，以及别人期待我做到的公正无私。我自将尽力不负期望。我要让在座的同事们根据我发表的意见来判断我，是否受到我的暂时较高责任的鼓舞多，而受到作为我国代表的责任的影响少。我个人认为，这两者的意见即使不是完全相同，也是差不多相同的。

各非洲国家代表团表示出的团结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我很尊敬它们，它们有力地维护会员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无条件不可侵犯性，强烈地拒绝因为以色列袭击恩德培国际机场是出于情有可原的情况即减轻或冲淡对它的谴责或不满。如果我的了解正确的话，在这坚定的立场背后，我们的非洲朋友们普遍关切的是：一旦这种行动受到宽恕和忽视，将更容易回到所谓炮舰政策，无防备的小国将任凭远近的大国支配。这是一个合理的顾虑，是没有人能挑剔的。尽管在激烈的辩论中可以理解地有人表达了一些相反的意见，但是，平心而论，必须承认，逐字记录也清楚地表明，并没有一个安理会理事国轻视这个顾虑。

另一方面，以色列和其他代表团大力维护政府使用适当手段的权利或责任，包括有限和局部使用武力来保护在别国境内受危害的本国国民的生命，如果别国不能保证这种保护的话。关于此点，辩论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每一种意见都引用了著名的法学家或联合国宪章条文作支持。似乎没有什么根据足以在这一点上达成协议，尽管一些安理会代表有杰出的法学背景，总因为安理会主要是一个政治机构，不是解决这样一个微妙问题的适当场所。可是，问题是不能忽视的，也许我们至少能同意把问题提交国际法委员会，让它为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普遍接受的原则奠定基础，从而避免，至少在将来，再有这次辩论中出现的分歧。

可是，同这些主要是道义和法律性质的动机相对立的，是每个国家的主权、独



立和领土完整受到充分尊重的不可争辩的权利。我相信，没有人怀疑，未经允许或预先通知而越过象乌干达这样一个独立国家的边界和领空的行为是对该国主权的侵犯。

不过，就算关于那个引起争论的点，似乎也出现了一个共同意见。七月十三日，星期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以最雄辩的措词提出了这个共同意见，让我引述他的话：

“关于人命神圣不可侵犯一事，先前我已作过明确解释，现在我要再度加以明确解释，我国政府，我国人民和我个人都认为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人命的丧失至为可悲，不论其为犹太人的生命、非洲人的生命，阿拉伯人的生命或其他任何人的生命。人命必须得到保养和保护并必须采取一切行动以保证生命得到维护。”

尽管以这个原则可能引伸出不同的结论，我们都同意的一点是：生存的权利是神圣的，不论种族、国籍、宗教或政治信仰如何，安理会最关切的应该是重申无条件尊重这个权利的需要。

这使我要谈到成们正在审议的事实的第三个方面——有些代表团在发言的主要部分，有些代表团在发言中不显著的部分，提到这个方面，但是没有有一个代表团认为可以忽略这个普遍加以谴责的方面。毛里求斯外交部长以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名义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是在说恐怖主义现象，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和空中劫机，这种现象近年来有了空前的扩大，形成破坏空中运输系统和瓦解我们社会的正常结构的真正威胁。

我虽然完全同意萨利姆大使所说，原则必须比任何其他考虑为重要。我觉得有义务向安理会提出一些我相信是恰当的问题。为了捍卫和执行宪章的主要原则，口头上的赞成是不够的，对吗？需要的是实现这些原则的行动。换句话说，如果世界社会不采取实际行动，执行同这些原则一致的约定规则，防止国家、集团或个人违反这些原则，则受害国家除了亲手维护法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人类历史表明，黑暗时代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国家当局或国际社会不能或无能主持正义时，

个人或国家就自己行使起捍卫正义的权利。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要末我们让——生动一点地说——目前在我们国家社会和国际社会内活动的那些新陀斯朵也夫斯基魔鬼夺取和瓦解我们的文明，以混乱代替秩序，要末我们联合起来采取适当手段来对付。我并不低估每个国家须要作出的牺牲——不是牺牲基本原则而是牺牲个别立场和利益。我们人民和世界社会的前途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在这个紧要关头的主要需求是跳出我们个别的利益和立场，优先考虑到同样影响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的人类共同利益。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容易的，我完全认识到产生这些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空中恐怖主义的破坏性现象的深刻根源。

几内亚代表很客气地引述了我在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第六委员会中关于这方面的发言。请让我提出几点作为补充，这几点载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二日之间的会议的正式简要记录中。这是四年前说的话：

“目前意大利主要关切的，是纯粹恐怖主义罪行，以及发生在有政治冲突的地方以外而影响到非政治冲突当事国利益的那些政治性的恐怖主义行为。针对无辜的人或国家的暴力行为危害到国际秩序的基础；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要优先拟订一个旨在控制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

我并且提议把七点意见包括在致大会的建议中。

这是我国政府一九七二年的立场，也是目前的立场；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因为这意味着国际社会直至现在仍未找到我当时提出的情况两个方面的补救办法。象中东一类的重大问题仍一点未获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增加了国际紧张，就被不负责任的人利用来证明他们的罪行具有政治和爱国性质。此外，世界社会仍未能填补国际法在防止和镇压这些罪行方面存在着的不能使人接受的漏洞。

过去的努力虽产生了东京、海牙和蒙特利尔公约以及其他一些规则，而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却很少成果。应该从这些局部性失败中汲取教训，制订新的和更有效的文书，让国际社会克服目前的无能状态。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远在从特拉维夫飞出的法国民航机被劫持以前就持有这样的看法。因此，昨天它们在国家或政府首脑一级的例行会议中作出决定，拟订它们间的一个条约，列出更强制性措施，

以便根除和防止国际恐怖主义、绑架和劫机罪行。

联合国作为一个旨在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的世界性组织，肯定是在全球范围拟订类似文书的最适当机构。

为了扭转事态的发展趋势，防止和镇压国际恐怖主义，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任何进一步的延误就会剥夺我们对下述两个威胁的唯一有效的威慑能力：首先是恐怖分子使用武力扣留人质使得一些无防卫的国家或弱国违背本身的意愿被卷入事件；其次是违反理性的犯罪集团的扩张和声势日壮，它们在我们的国家社会和国际社会内毁灭我们的文明。

安理会在应付这个局势时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一方面，坚持无条件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另一方面，促进拟议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管机构内采取后继行动。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确的话，这正是我们尊敬的秘书长，七月九日向安理会发言的意思，他说：

“最后，我希望，尽管会有各种强烈的意见在这场辩论中出现，安理会还是会找出一个方法，向世界社会指出一个有建设性的方向，使我们不再重复人类过去的悲剧和安理会即将审议的那种国家间的冲突。”（第一九三九次会议，英文本第8至10页）

我了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有意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先生，我要说几句关于你自己的发言的话。你以主席的身分或以意大利代表的身分，明确地谴责国际恐怖主义。你说你赞成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将来发生此种行动，你还倡议要严厉处罚那些采取此种行动的人。

关于这一点，我要提请你和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注意七月十二日《纽约时报》刊载的一项报道，该报道说贵国给予两个在劫机过程中杀害了一名苏联空中服务员并伤害了两名旅客的恐怖分子庇护。他们在土耳其待了一些时候，然后他们获得贵国的庇护。

现在我们怎能把你所说的必须处罚罪犯的话，我们现在谈的不是政治犯罪，而是一般的犯罪：就是我们昨天听到的关于一个生死不明的妇女据说是被谋杀的报道。

现在，关于空中服务员这件事，她的命运是知道的：她想要保护旅客，但是那些罪犯杀了她，而贵国却包庇那些罪犯。这项报告是在七月十二日的《纽约时报》上。

现在，主席先生，我们怎能把你的谴责同《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事认为是精神一致呢？或许你可以给我们一个解释。

主席：现在我答复苏联代表，我不知到他所提到的事件，但是我将查问一下。无论如何，在现阶段，如果我是他的话，就不会对任何一篇文章里所报道的事信以为真，即使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份报纸《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

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我知道他要发言。

贝内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只对利比亚代表以个人身分所提到的附带的问题说几句话。

我很感谢利比亚代表向斯克兰顿州长表示的慰问和问候，我确信斯克兰顿州长也会这样说。但是利比亚代表对斯克兰顿州长发言中的某一些话表示失望，使我感到苦恼。利比亚代表引述了斯克兰顿州长的话，但是只引述了一部分。既然

利比亚代表的法文和英文都很流利，我想他或许已稍为仔细地读了英文本。或许他读过了英文本后，就不会这样失望了，不过仍可能不同意。

简言之，我不能同意利比亚代表只引述斯克兰顿州长一部分的话的作法，这样是错误的引用，导致错误的观点。因为我不愿相信利比亚代表是故意错误地引用斯克兰顿州长的话，或许我读出那些话的有关部分的全文，才是对安理会最有好处的。我现在读七月十二日斯克兰顿州长的发言：

“以色列拯救人质的行动必然会暂时破坏乌干达的领土完整”。

利比亚代表团对这说明事实的话大加利用。我们都认为是破坏了领土完整，但是他只引述到此处为止，而斯克兰顿州长却继续说：

“在正常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宪章这种破坏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当一国的国民在眼前有伤亡之虞而所在国政府不愿或无法保护他们时，一国使用有限的武力来保护他们，是众所公认的权利。这种从自卫权引伸出来的权利，只限于在必要时以适当方式使用武力保护受到威胁的国民免受伤害。

“在恩德培事件的情况，显然符合这种保护国民权利的必要条件。（第一九四一次会议，英文本第31页）。

主席：还有几位参加辩论的代表要求就审议的项目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是古巴代表，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科斯塔先生（古巴）：主席先生，古巴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会务。这种高兴更由于意大利和古巴基于互敬而维持着友好的关系而加深。

我要谢谢你，同时通过你谢谢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应允古巴的要求，让古巴参加安理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朱德的逝世表示哀悼，同样地我们要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哀悼该国前任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博士的逝世。

关于审议中的项目，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审议的现阶段详细叙述恩德培事件及其背景是无益的。在我之前的一些发言者已使我不必再来做这件工作。

古巴代表团认为七月四日以色列在恩德培机场的行为无疑地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条款。对一个独立不结盟的国家，同时也是联合国社会的一员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绝不能自我辩护，同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不能容忍的冒犯。

若干代表团在此地想以乖谬的论据和对法律的错误解释来曲解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项目。一个显然是侵略和血腥的行动竟获得一些人的喝采，有些人还要为其辩护。《联合国宪章》反驳了一些人可能试图为这个行动提出的歪曲解说。这载于《宪章》第二条第四项：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依照这一条，我国代表团要问问安理会的理事国：乌干达对以色列使用威胁或武力了吗？乌干达威胁到特拉维夫政权的领土完整或独立了吗？答案是简单明白的。乌干达只不过是想要为那些被以武力带到其领土的旅客的命运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乌干达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法国空中巴士燃料仅够飞行十五分钟时同意其降落。

乌干达这样做，却反而遭到以色列的突击，这个突击夺去了许多乌干达人的生命，同时造成很大的财物损失。这种行动完全符合以色列政府一贯的侵略和种族主义政策，联合国和国际舆论关于它的档案真是汗牛充栋。

当然，我们对于一些代表团声称一个国家拥有所谓使用武装部队来保护在外国领土上的本国国民的权利并不感到惊奇。这素来是帝国主义者在全世界各地犯下各种罪行所利用的借口。

这种观念在拉丁美洲留下很深的伤痕。

现在，恩德培事件发生了，他们同样为在非洲实行大棒政策辩护。

我国代表团毫不怀疑恐怖主义行动是对无辜平民的生命的威胁，并且构成错误的行动路线，它们必须受唾弃，但是以色列对一国政府并非自愿地成为一项困难的冲突的场所所采取的官方恐怖主义，也同样应予唾弃。这就是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

因此，我国代表团要求安全理事会谴责以色列，因它破坏乌干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要求以色列赔偿乌干达的损失。

七月四日的事件也是对所有不结盟国家的一项警告，特别是指出了非洲应当团结一致，以保卫其人民应当享有的伟大美丽的未来。

主席：谢谢古巴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关于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我和他一样具有同感。

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是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首先我要和在我之前发言的人一样，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任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博士阁下的不幸逝世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表示真诚的慰问。

我们认为今日安理会审议的问题触及到所以成立本组织的根本理由。这个问题就是对本组织会员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空前未有的非法的、应受谴责的侵略行为。这是唯一的议程项目，我们希望安理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以对会员国的诽谤性指控来冲淡这个项目，而这些会员国正确地认为不论国家大小、力量强弱，维护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崇高原则必须受尊重及维护。

以色列代表昨天在安理会上说索马里是对邻国的威胁，这种控诉正是以色列政府数年来企图引起误会、破坏非洲团结、以便以色列从空中获利所采取的政策特征。

非洲各国立刻识破了这种政策。实际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已经同以色列断绝关系，并且拒绝它的财政和经济援助，因为它们由经验得知此种援助是破坏它们的独立和主权的诡计。

非洲各国立刻看出了以色列同比勒陀利亚政权勾结，以便继续压迫南非的非洲人民。从恐怖主义中诞生并且靠恐怖主义成长的以色列，现在竟这么无耻地指控其他国家是恐怖主义的中心，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今天有哪个国家可以同以色列对无防御的人民所进行的暴行和侵略的记录相比？除以色列以外还有哪个国家曾下令对无防御的村庄和营区进行有系统的空中轰炸？

我还可以继续举出一大串以色列对其邻国进行的暴行，但是如果我这样做，我就掉进以色列和其支持者希望我们掉进去的陷井里。我不会掉进它们的陷井。

这次辩论的目的不是要讨论恐怖主义。也不是要讨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要讨论以色列对乌干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略。

那些专谈恐怖主义问题的代表们，对于在乌干达机场上死于以色列突击队手中的无辜者连一句同情的话都没有，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恩德培事件的后果，可能证明以色列政府这一次的胜利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我这样说是因为如果再发生不幸的劫机事件，则以色列政府和那些在这次事件中同以色列政府合作的人很可能会发觉他们的信用由于这次事件而大受打击，差不多不可能再有任何谈判了。

索马里大使在恩德培事件中充中间人，不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而是因为他作为阿拉伯集团派驻乌干达共和国外交团团团长所负的人道主义的责任。他的努力大大地获得积极参与谈判的人的赞赏，导致了许多人质的释放。如果他当初拒绝负起谈判的责任，文明社会会说什么呢？

我们能够了解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上所说的话吗？他说参与此种谈判的国家都是共谋。

恩德培事件所牵涉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影响，在我们对这件事作出最后的决定之前，值得安理会最认真的考虑。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位是乌干达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阿卜杜拉先生（乌干达）：主席先生，我代表乌干达代表团感谢你对安理会工作的指导。我也要向所有对安理会讨论作出了宝贵贡献的代表团表示诚挚的谢意。

不论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星期五，在安理会的发言里说了什么，事实仍然是：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正在受审，因为它犯了严重罪行，蛮横地侵略了尽力援救所有人质的无辜的乌干达人民。因此，乌干达竟然变成被告，以色列代表竟然企图使安理会相信乌干达与劫机者合作，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安理会正在审议一个问题，也只审议一个问题，它就是：以色列对乌干达的侵略行为。因此，安理会应该一致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要求以色列对入侵时人民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作出赔偿。以色列代表并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以色列的论断。以色列代表所有发言都只是一堆谎言，一心想把安理会的注意力从实际问题——也就是，与召开这次会议有关的以色列侵略乌干达的行为——上转移开来。

以色列不但不感激乌干达拯救了人质的性命，反而侵入了乌干达。有人告诉安理会，以色列对它在乌干达的所作所为引以自豪，甚至厚颜无耻地公开宣称它还会再干。安理会应当把以色列在乌干达的行径当作盗窃行为。以色列就象是盗贼，夜里破门闯进人家，杀害里面的人和破坏财物，一走了之，事后还向全世界自夸它的强大。

乌干达的的确确是被侵略了。但在近代史上，这种事情的发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许，我们不必追溯太远，就提出一个近代的珍珠港事件来说吧。当时美国的军舰完全被日本的武力所消灭。世人都不能相信这件事。然而美国的的确确成为一次意外袭击的牺牲者。就军事而言，这件事的发生难道表示美国是虚弱的吗？或者，难道它表示美国的军事实力就完结了吗？

因此，侵略乌干达事件的有关情况应当以这个观点来看。在入侵的时候，乌干

达政府在恩德培老机场只派驻了极少数——只有一个排的士兵保卫该地区。此外他们的装备也只有自用的步枪。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惊动劫机者，否则它会严重地危及人质的性命。尽管以色列在准备和演习对乌干达赤裸裸的侵略行动，乌干达在入侵事件发生之前仍然很有诚意地和以色列在谈判。乌干达是被欺骗了，然而这种事决不会再发生。我要向安理会保证，乌干达是强大的，我们的军队一向有能力击退任何可能的侵略者，不论它是以色列或是其他的国家。

我们敦促安理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以色列侵略乌干达这件事上，而不要分心。我们促请你在审议这个事件之后，毫无保留地谴责以色列。

大家都知道，乌干达共和国总统为了维护人道，尽全力设法使所有人质得到释放。大家都知道，在入侵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多数人质都已经被释放了，没有损失一条命，以色列不但不表示感激，反而动了手，侵入了乌干达，造成人命和财产的严重损失。大家从这件事里必然吸取到的一个教训：由于以色列对乌干达采取这种行动，将来几乎不会有任何国家再愿意出力拯救劫机事件中可能受害者的生命。

以色列代表告诉安理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在乌干达坎帕拉有一间办事处，即使如此，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巴解组织在联合国还有观察员的地位呢！任何国家都可以和巴解组织有来往，巴解组织甚至在纽约也有一间办事处。

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星期五，有人告诉安理会，以色列侵入乌干达是因为乌干达犯了全世界的海盗罪。换句话说，乌干达的行为相当于在公海上的海盗行径。当以色列侵略乌干达的时候，它不仅把人质带走——以色列自称它立意这样做的——也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人和无端地破坏了我国许多财产，包括一些昂贵的飞机在内。那么，究竟两者之中谁是海盗？是乌干达还是以色列？这点我留待安理会来决定。

有人在崇高的安理会上举出的另一个论点是：以色列侵入乌干达是行使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规定的固有的自卫权利。以色列代表不厌其烦地阐述了这一点，引用了许多事实上与这个问题毫不相关的例子。他只是想把安理会的注意力从正在审

议的问题——以色列侵略乌干达——上转移开。这种对乌干达有预谋的侵略就是对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一员的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项、实际上，如果我们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个论点，就等于允许象南非和以色列这类有侵略倾向的国家去侵略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因此，安理会必须完全拒绝这种论点。

大家还记得，入侵事件发生以前，阿明总统已成功地说服了劫机者释放许多人质和延长最后期限。在他继续尽力设法使所有人质获得释放的时候，以色列却擅自行动，决定侵入乌干达。

以色列用来打动安理会的最后一个论点是：乌干达没有，或不愿意，保护当时在乌干达领土上人质的性命和财产。换句话说，以色列想尽办法暗示，乌干达没有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有人告诉安理会，乌干达政府似乎事前就知悉了劫机事件。

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又指控，我国总统参与了，或者默许了，劫持法国空中巴士的事件。他举了很多例子来作证明。

我要先引用上星期五法国代表的发言。他说：

“我们都知道，这件事的起头是：六月二十七日，一架载有250名乘客的法航空中巴士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途中，在科孚上空被劫持了。

“法国当局在获悉劫机事件之后，通知了一些法国大使馆，包括在坎帕拉的法国大使馆在内，要求他们采取步骤，设法使这架飞机能获准降落，因为它的燃料很快就要用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坎帕拉的大使就这件事和乌干达当局进行接触的原因，乌干达立刻准许它降落。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四十分，这架空中巴士在恩德培降落。法国大使赶到机场。但是他未能直接和劫机者或机员和乘客接触。伊迪·阿明元帅也赶到机场。”（第1939次会议，英文本第82页）。

也让我再说一次我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星期五，的发言和我国政府一贯的态度：乌干达不宽容恐怖主义。马干达并没有象以色列代表所指控的那样供给劫机者以武器。只要打开《新闻周刊》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那一期第28页就有证明。其中报道：

“被劫持的法航第139次班机是从特拉维夫起飞，飞往巴黎。它按照预定路线在雅典降落，登机旅客中有两个阿拉伯青年，携带了一个有‘夹心枣子’标签的大铁皮盒子，可能里面藏有武器或爆炸物。这架双喷射引擎的空中巴士起飞后不久，一场可怖而熟悉的情景就开始了。据头等舱乘客84岁的法国人米歇尔·马里于斯·亨利先生说，有两个男人突然从他邻近的座位中跳出来，掏出左轮枪，用英语宣布：“我们是革命分子，这架飞机现在是我们的财产。我们要把你们带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携有手枪，手榴弹和短机枪的其他劫机者就命令旅客把手举起来，一个瘦削，衣着讲究，似乎是欧洲人的男人，看起来显然是头子，他拿起了驾驶舱里的广播麦克风说：“我们是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代表把恩德培劫机事件的复杂性看得过分简单了。与劫机者进行谈判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以色列代表是否能告诉安理会利达机场死了多少人？安理会是否忘记了喀土穆事件和牵连到石油组织部长的维也纳事件？阿明总统在恩德培的努力应当从这样的背景去看待。当时情况很危险，必须非常小心地处理。我们乌干达人认为这个事件很严重，对这种性质的问题采取了实际的作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总统决定与劫机者谈判释放人质的原因。

以色列侵入乌干达这件事也要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也就是南非在非洲南部，以色列在非洲北部，企图组成一个权力轴心，来威胁和控制非洲。古尔将军的声明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危险。他说，如果肯尼亚拒绝让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飞机使用降落设备，他们也会用武力降落。

我在第一次发言的开头就说过，安理会是為了审议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侵略乌干达而召开这次会议的。然而，以色列代表却对我国总统作出胡说八道、完全不

实的指控，千方百计地想把安理会的注意力从这一点上转移开来。当然，这种做法是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性宣传的重要成分，想用它来掩盖以色列对乌干达懦怯的侵略行径。

我再次要求安理会用最强烈的措词毫无保留地谴责以色列对主权国家乌干达共和国野蛮，无故和无理的侵略。乌干达要求以色列赔偿侵入造成的全部生命和财产损失。我国主管当局正在研究赔偿损害要求的细节。

以色列代表和美国代表猛烈地评击了我国和我国总统。我要再次行使答辩权，答复这些代表在安理会的的天指控。

美国代表在安理会上次发言中提到了我国。他不仅呼应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不实指控，指乌干达是劫持法航空巴士的同谋，而且竟告诉本机构他为以色列对乌干达——一个非洲国家，也是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一员——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感到多么兴奋。

美国代表的这种论调毫不使我们惊奇，我这样说是因为整个世界太清楚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利坚合众国上上下下的控制已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很清楚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对美国决策机构的影响。据报导美国联合参谋长会议主席布朗将军在不久前就这样说过。

“‘你简直不会相信它有这么厉害’，布朗说。‘以色列人向我们要装备，我们说我们绝不可能要求国会支持这样一个方案。他们说“不要担心国会。我们会应付国会”。

“‘这些是另一个国家的人’，布朗又说，‘然而他们能办到这一点。他们在我国拥有银行，报纸。你只要看看这个国家里那儿有犹太人的钱就够了！’”

因此，人们听到美国代表对以色列侵略无辜的乌干达人民的罪行喝采，又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乌干达唯一的罪行——如果它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罪行的话——只是让一架只剩15分钟燃料的飞机降落在恩德培，因此而拯救了250多人的生命。我

让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明智地作出必要的结论。

然而我一定要指出，美国人民——我很确定，他们不满意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他们事务日益增加的控制——总有一天会摆脱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控制。就好象我们在乌干达驱逐了榨取我国经济的犹太复国主义剥削者一样。在他们被我国驱逐出去的时候，他们每天榨取了三百多万先令。我只想诚恳地警告在这里的美国代表，如果美国不小心提防，犹太复国主义总有一天会使美国卷入它自己可能永远无法脱身的麻烦里去。

现在，我要读一段美国代表在这里的发言：

“在这里和其他地方的非洲朋友们：关于南部非洲解放的问题，我国政府是同那些决心以和平手段寻求多数统治的人站在一起的。我很高兴，我在联合国的时候，我国采取了这种政策。”（第1941次会议，英文本第37页）。

这是最大的虚伪。他们怎么能一方面自称支持在南非实施非洲人的多数统治同时却反对非洲解放运动为了解放他们祖国而采用武装斗争？斯克兰顿先生应当知道得更清楚，他应当知道，因为那个非洲地方的种族主义政权顽固地拒绝以和平方式把权力移交给多数人，非洲和非洲自由斗士明白了武装斗争已是他们最后的手段，才诉诸武力的。

我再问一次：美国代表怎么能声称美国支持非洲，同时美国却以投资的方式把金钱源源送到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手里，因而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继续维持种族隔离政权？美国代表怎能声称美国支持非洲，同时，美国人却在非洲与解放部队为敌，他们在安哥拉扮演的角色就是证明——在那里，已合法地处决了他们的一名雇佣兵。

犹太复国主义代表说了一大堆话，指控我国总统是恩德培劫机事件的同谋。我要再次明白地驳斥他的一切指控全是胡说、废话和谎话，乌干达完全是基于人道主义和在法国政府的要求下才让那架法国飞机降落在恩德培。如果当时乌干达拒绝了

在恩德培降落的要求，那架法航空巴士上的250名乘客将会有什么命运？今天的情况又会是一些什么样呢？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在安理会的指控是安理会有史以来所听到的最荒谬无耻的谎话。你救了某人的命，他却指你想杀他，反过来杀你和你的家人！

然而，为什么以色列要这样血口喷人地污蔑乌干达和它的总统？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和它们的代理通过它们的报纸和电台大肆诽谤？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明白。

首先，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公然侵犯乌干达共和国——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一员——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时被当场捉住。他们的手上沾了血，永远沾了在恩德培机场上被他们残杀的乌干达士兵的血。以色列侵略乌干达，是因为乌干达在揭露犹太复国主义丑陋面目上起了带头作用，是因为乌干达从它的领土上驱逐了犹太复国主义剥削者，——他们剥削乌干达，每天拿走了三百多万先令。此外，也因为乌干达在以色列和几乎全部非洲国家断绝外交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洲国家同情和支持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他们的土地仍然被犹太复国主义者非法占领着。以色列侵略，也是因为乌干达谴责了，今后还将继续谴责比勒陀利亚——特拉维夫轴心，这个轴心在十月战争期间表现得很清楚，在拉宾—沃斯特会谈和沃斯特—基辛格会谈之后更是明显。

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傲慢地谈到了他的国家对非洲的“尊重”，也谈到乌干达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让我这样回答。以色列想分化非洲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非洲已经很有经验了，是它自己的主人。非洲人知道他们的敌人是谁，非洲不会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分化，也不会被现在停泊在蒙巴萨的美国军舰和军用飞机分化。这些军舰和军用飞机出现在非洲的那一个部分构成了对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整个非洲独立的直接威胁，对此，必须给予最强烈的谴责。

我要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被英雄的越南、柬埔寨、老挝人民狠狠地击败之后，现在把它丑陋的头伸到非洲来。但我要向安理会保证，美帝国主义也注定将在非

洲遭到象印度支那一样的失败。它最近在安哥拉的败退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乌干达和它邻国之间的关系，我只要说：我们之间的任何误解应当被看做是暂时性的家庭纠纷。我很有把握，不管有什么问题，我们将会把它们清理出来，用非洲方式解决，而帝国主义者将被踢出非洲。

我要提醒犹太复国主义代表，我们乌干达人引以自豪的是：乌干达的经济已经掌握在土生土长的乌干达人民的手上。我也要提醒他，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所有受到影响的人都付了赔偿。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那些从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来的人付了赔偿。有关赔偿英籍亚洲人的问题仍在进行谈判。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别想把人民控诉自己经济权利说成种族主义来迷糊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安理会，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只是一堆谎言，企图把安理会理事国的注意力从审议中唯一的真正问题上转移开。这个问题就是以色列对乌干达人民犯了侵略罪行，构成了对乌干达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

我保留必要时答辩的权利。



主席：在我请这个辩论的下一位，也许是最后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想对我以前给苏联代表的答复补充几句话。

根据他自己对事件的描述，我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我相信他指的是若干年前在土耳其降落的那架被劫持的苏联飞机。当时和事后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官方的消息。意大利当局当然过去不对，现在也不对这件事负有任何责任。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件事更加证明有必要通过一项国际公约，严格责成各国对劫持者进行起诉，不让他们自由往来世界各地——最低限度在他们还没有由捕获他们的国家进行审判之前。顺便说说，我相信这就是那个被土耳其当局捕获的劫持者的结果。土耳其当局根据自己实际的刑法，判处了劫机者入狱一段时期。

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会议的审议显然就要结束，我希望在这个时候向你和安理会的理事国，特别是我的非洲同事们呼吁，以人道的立场采取行动找寻多拉·布洛克夫人的下落。如果不幸地真的不出我所料，发觉她已被谋杀丧生，我吁请把这位七十五岁的老太太的遗体归还其家属，以便妥为安葬。我不相信我向安理会作出的呼吁会得不到反应。

主席：从整个辩论看来，如果我可以就特别这个人道主义事例解释安理会理事国的意见。我将向乌干达外长转达这项呼吁。

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因此，我就认为我们的辩论已经结束。如果没有别的代表想在这个时候发言的话，按照一般程序和成例，我就认为安理会已准备开始对在安理会面前的，分别载于S/12138和S/12139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我建议如下的程序：首先，希望在表决前说明对这两项决议草案的投票理由的理事国将有机会这样做；安理会然后对载于S/12138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我知道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希望在这个时候向安理会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在我们开始表决之前，我想代表我的非洲同事——贝宁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代表团就我们自己的决议草案的表决方法向安理会发言。

我在安理会的两次发言中都强调，非洲很关心乌干达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侵犯的事情。安理会上的非洲发言人——我的利比亚兄弟和贝宁兄弟，以及最重要的——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二十七届常会主席我的兄弟毛里求斯外长都清楚地表示了这一点；此外，一些不是安理会理事国的其他非洲代表团也有同样的表示。这些代表团向安理会表示了非洲统一组织及其成员国对这件事的一致看法和一致关心。

我自己在两次发言中都说，我们本来就希望这个辩论能够在没有过分激动的气氛下进行，使我们全体同事有机会公正地处理这个由非洲国家向本机构提出的控诉，使他们能够对这个关系到我们中一个成员国的主权被侵犯的控诉的是非曲直作出表示。

可惜，事与愿违。联合王国代表以他本国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名义提出载于S/12138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从这一点，我们见到有人企图完全掩盖乌干达主权被侵犯的事实。

当然，我将有机会在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前说明我国代表团的投票理由，但现在，关于我们自己那项载于S/12139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考虑到表现出来的对抗行动，考虑到似乎有人决心对非洲的正当控诉完全置之不理，至少也决心含糊敷衍了事，我们认为，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适宜坚持把载于S/12139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因此我代表这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宣布：我们不坚持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但我们要声明，这个草案将留在安理会记录上。同时，非洲国家也保留他们的选择权，在适当的时候根据我们在这个情形下极力坚持的基本原则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讨

论重新进行审议。这就是我代表我的贝宁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同事和坦桑尼亚代表团就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所要说的话。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将说明我们对联合王国和美国的决议草案的投票理由。

主席：我要向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保证，我已细心注意到他以他的代表团和安理会其他非洲理事国代表团的名义所说的话。

我现在请愿在表决前解释他们的投票理由的代表们发言。

米尔札先生（巴基斯坦）：我在七月十二日的发言中说，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是以色列侵略乌干达。它必须坚持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谴责以色列对乌干达的侵略行径。

此外，我还说安全理事会应要求赔偿乌干达因为以色列的行动而在人命和财产方面遭受到的重大损失。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除了极少数的发言人外，所有参加我们这个辩论的人都同意这个以事实为根据，尊重《宪章》原则、国际法、国际道义的意见。

虽然目前不在敦促把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但我们认为这个草案符合普遍的愿望，足以应付我们面前的问题。它的用语温和，建议采取的行动是在这个情况下起码的要求。我们现在支持它，将来安理会再次审议这件事的时候也一定继续支持它。

我们在七月十二日的发言还表示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讨论恐怖主义的罪恶。我要重申我们巴基斯坦人从来没有宽恕或支持包括劫持在内的任何恐怖主义行径。此外，我们曾说，我们不应有选择性地给恐怖主义下定义，应该全面地作为一个整体去讨论这个问题。

至于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团所提的关于劫持的决议草案，我们遗憾地注意到，这项决议草案同我们面前的议题没有关系。我们还特别注意到，草案执行部分第3段仅仅

“重申必须……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对以色列违反《宪章》规定，侵犯乌干达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却一字不提。

正如我一会儿前所说，我国和我国政府反对和痛惜劫持行径。但无论在实质上或重点方面，S/12138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确实同我们在审议中的议题没有关系。巴基斯坦代表团因此遗憾地声明，巴基斯坦代表团将不能参加该项决议草案的表决。

艾内斯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我愿以圭亚那代表团的名义就你提议付诸表决的S/12138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发表简短的意见。

该项决议草案的主题——劫持的问题——并不是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的议程项目。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是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毛里求斯总理提出的关于以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的侵略行径的控诉。

当然，正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

“那些企图曲解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即以色列侵略乌干达的问题的含义的人只会使国际社会更加难于通过联大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一个解决国际恐怖主义现象的办法。就圭亚那来说，它仍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为这个在进行中的找寻工作作出贡献。”

因此，为了上述理由，我国代表团将不参加S/12138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的表决。

博亚先生（贝宁）：我国代表团在较早的发言中已经说过，议程上的项目是以色列对乌干达的侵略行径。无论S/12138号文件内所提的国际恐怖主义和空中劫持是如何的重要和迫切，我国代表团认为，该草案同议程上的项目无关。因此，我们很遗憾地不能参加表决。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三国草案的提案国已撤回该提案，而这个草案正是我们认为是对安全理事会审议中的问题达成决定的适当基础。

S/12139号文件内的两国草案实际上将迫使我们改变议程项目，讨论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虽然重要，却没有列在安理会议程上。我们已经两次声明我国的立场。我们将不能够参加这项决议草案的表决。

主席：安理会现在对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载在S/12138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无。

弃权：巴拿马、罗马尼亚。

贝宁、中国、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表决的结果是：六票赞成，零票反对，两票弃权，七个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决议草案未获得法定的多数，没有通过。

我现在请那些愿在表决后说明他们投票的理由的代表们发言。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很感激你让我解释我国代表团的投票理由并答复我的同事和朋友坦桑尼亚代表的发言。如果他不介意，我要说那是非常庄严的言论。

在我解释我国代表团的投票理由之前，我要同法国代表团一样，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统海涅曼博士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我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如此亲切友好的关系，对于这个一生为民主，真理和人类尊严而努力奋斗的明智杰出的政治家的去世，特别感到悲痛。

回到我们刚才未通过的载于S/12138号文件中的草案，我要说这项草案序言部分第一段没有提到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毛里求斯总理的来信。我只要说这是一种消极罪而不是一种积极罪，如果这项草案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进行，我们就有必要在某个阶段提出适当的修正案。我希望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就未在草案的内容中提及来信一事，接受我的道歉。很不幸，安全理事会没有通过这项草案。

这是一次漫长，困难而有时候是激动的辩论。我认为那未必就是坏事。确实，那或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这儿处理的是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对国际关系的处理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我认为我们本来应当利用这个场合开诚布公地表示我们的意见，尽管我们未能达成协议，但我相信在辩论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许多关注事实上各方都有同感。

我觉得这次辩论的大多数言论中，贯串着某些共同的组成部分。

首先，我想几乎我们大家——如果不是全部已经发了言的人——都明白地谴责劫持行为和国际恐怖主义，并且安理会一般也认为必须采取进一步的国际行动，即使不是现在，至少也要尽早采取行动来防止今后的劫持行为并惩罚那些须对这种行为负责任的人。我们非常有趣地注意到这个一致的看法，我们也希望非常慎重地考虑现在该做些什么。

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要提请安理会注意欧洲理事会理事国政府首脑于七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上所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声明。

我要特别强调的第二点是围绕着本议席所表示的关切，即必须维护法治和《联合国宪章》并保证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尊重。我国政府充分了解许多方面就以色列在恩德培的行动对那些原则的影响所表示关切。

我要提请注意的第三点（我认为也是这次辩论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调和一个国家无疑地负有的保卫其国民的职责和我刚才列举的必须尊重的那些原则。

第四，也许我可以再增加一点，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是不会有争执的。我们都为这些事件导致人命的丧失深感遗憾，不管涉及的人是黑人还是白人。为什么布洛克夫人在这次辩论中成为重要的话题，其中一个理由是很简单的。这不是因为她是白人，也不仅是因为全世界都为这一位七十五岁病妇所遭遇的明显下场而震惊。而是关于她的下落，乌干达政府还想撒谎。

我很高兴乌干达外交部长在这里听取我不得不说的话——至少我希望他会听着。我可否向乌干达外交部长保证联合王国政府和人民是不会向威胁低头的，不论那些威胁来自何方。你能说服英国人去做许多事，但敲诈是无效的。

我想这些无疑是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来都会成为众口争辩的题目，我们当然不应该想要逃避它们。但是正因为安理会对于在我们本星期举行的这种辩论过程中审议的这类问题很难获得协议，所以我在七月十二日的发言中曾建议安理会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设法避免将来类似事件的发生，比通过一项对已发生的事件的裁断要好得多了。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国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共同提出了这项草案，谴责劫持法国航空公司喷射式班机的行为，痛惜由于这次事件而丧失的生命，重申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并要求国际社会考虑出一些方法来确保今后国际民航的安全和可靠性。

就安理会内对这四个要点所表示的非常广泛的协议看来，我们非常遗憾安理会今天不能就通过这个决议草案一事达成协议。

然而，我们不但很感激那些投票赞成它的代表团，也很感激那些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参加投票但却表示自己赞成决议草案的条款的代表团。我们提出这个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草案绝不意味着我国政府对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怀着敌意，也不能认为这是我国对他们的急务或利益缺乏同情。我们在这里的兴趣是要促成我们认为是一个均衡公平的决议，照顾到恩德培事件的各方面，我们希望这个决议能够为未来国际合作行动奠定基础以对付恐怖主义的灾祸。

我国代表团引以为憾的是：安理会居然不能达成一个协议的结果。然而，我们觉得这儿的讨论已达到了提出和确认，也许也是突出了一些有关的重要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了解这些问题。

因此，虽然今天不可能同意采取行动，我们希望这次辩论将推动进一步的国际讨论，特别是关于劫持的问题，而在最近的将来某个时候我们将能够在联合国取得协议，采取行动，以期阻止将来的劫持行为，并将这个威胁我们社会组织、危及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并置无辜生命于危险境地的恐怖暴行从世界上除去。

安倍先生（日本）：我要就我国代表团对于联合王国代表以美国和他的国家的代表团名义提出的载于S/12138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所投下的票作一个简短的解释。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它。然而，我国代表团要说明，它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显然是侵犯了乌干达的主权，这是我们感到非常惋惜的。我们觉得如果在草案中能够照顾到这一点，那就会更好了。然而，我国代表团坚决反对劫持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一切其他行为，能够接受载于这项决议草案中的所有各点，因此对它投了赞成票。

贝内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说几句总结话之前，我要和其他人一起为海涅曼总统的去世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表达我的悼唁。海涅曼总统在我国很受尊敬，他代表一个与美国有密切持久关系的国家。



我要对我们现在正要结束的辩论的进行与实质表示一些看法。

美国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安理会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对付两个星期以前对法航飞机及其乘客犯下的劫持罪行。我们认为我国和联合王国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是一个标识着安理会决心反对劫持行为,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关切这次悲剧事件中的人命丧失的均衡的尝试。

我们感到相当满意的是,大多数会员国都参加了表决,没有一个代表团愿意投票反对这样一个均衡的决议草案。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这次争论中,各方的那些与恐怖主义行为所带来的事件无关的人白白送了命。我们再向所有有关的家属,特别是对多拉·布洛克夫人的家属表示我们的由衷慰问。

此外,我们对我们的非洲同事在这次辩论中强调的要点感到极为敏感:必须支持和保护各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这是我国政府充分坚持的一个自然而基本的标准。我国于一九七六年回顾其历史,特别记得我们自己从建国开始就强烈地关心这个原则。然而我们不认为按照国际法恩德培事件的特殊性是不能辩解的。同时,我们不认为它会成为任何未来的不属于同样的特殊情况而非法进入他国领土的借口的一个先例。

我们认为这次辩论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对整个的劫持问题以及环绕着以色列在恩德培的行动的问题,发表意见。这次辩论提高了大众和政府对于空中劫持给今日世界带来的真正威胁的认识。安全理事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场所来让我们充分讨论在恩德培实际发生的事以及这次事件的起因。在这次辩论中,我们大家都清楚地得到了一个教训:我们都深深感到劫持和利用无辜人民为人质的行为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多么巨大。

联合国会员国在这次辩论中所作的若干发言,表示了它们敦促本组织对劫持行为采取行动的意愿,我国代表团为此感到鼓舞。我们特别赞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代表的发言，他宣布他的政府将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敦促国际机构采取行动来防止擄取人质的行为。我国代表团将坚决支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努力，并且我们将与他们以及其他国家密切合作，鼓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支持一个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公约。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苏联代表在七月十三日的安全理事会上说：“……我们愿意同其它国家一道，采取更多新的措施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行动（第一九四二次会议，英文本84—85页）”

本组织所有会员国愈早正式承认劫持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愈早采取积极步骤来消灭这个国际的非法瘟疫，我们自己和我们子女的生命就会更加安全。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要简短地说几句话，我首先要以坦桑尼亚代表团名义同其他代表团一道，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任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博士的早逝，向该国代表深深地吊慰。我们要请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将我们的悼念之情转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

其次，我要尽可能简短地解释坦桑尼亚代表团的立场。我们没有参加表决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事实上，我在前次的发言中，已详述其理由。我们认为这项决议草案不是一项应当在安理会现在进行讨论的情况下提出的草案。

采取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事长期以来所采取的不参加表决的立场，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觉得我国代表团如果表示弃权或投票反对这项决议草案都是不妥当的，那样做，也就是表达了对于我们对于决议草案的是非曲直的看法，我们不认为现在是我们表示态度的时候，目前的情况也不容许我们这样做。

最后，这项决议草案的绝大部分我们认为无可反对的，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恰当地仔细审查这项决议草案就表示我们的立场，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最后一点：我不赞成我们的联合王国和美国同事所表示的认为这项决议草案是一项均衡的草案的看法。

主席：没有其他代表团要解释投票理由。投票过程就此结束。

最后一位发言者是毛里求斯总理哈罗德·沃尔特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哈罗德·沃尔特阁下（毛里求斯）：首先我要为我们都已知道的悲哀丧事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转达我国政府的慰问。

我也要向法国政府和人民祝贺他们的国庆日。

令人惊奇的是在七月四日这一天国家首脑最高级会议在早上很早的时刻听到了在乌干达发生的事，而七月四日正是美国的国庆日。我们却正要在七月十四日结束关于这个令人悲痛的悲剧性事件的辩论，这个巧合是多么奇怪。

主席先生，我要代表非洲统一组织感谢你召开了安全理事会并让安理会对于一个没有前例的情况进行一次各抒己见的健康讨论，着重在乌干达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及其影响。

我希望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对将来的指引会有用处，凡是聆听了这些偶而很刻毒但大部分时间都非常严肃的辩论的人，都不会忘记安全理事会所有会员国以及得到阁下允许而发言的人对于《宪章》揭示的神圣原则的强调。

我也要指出，召开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的决定是由在毛里求斯的圣雄甘地学院——一所以伟大的爱好和平者甘地命名的学院——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最高级会议提出的。我想我引用一句甘地说过的话会很恰当，他说：“单凭真理，就会胜利。”

尽管是多么短暂，但我们怎能忘记一个联合国中姐妹国领土受到侵略的事？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引用温德尔·菲利普斯的话来让我的同事们深思，我希望这些话的要旨以及当他写下这些字句时鼓舞着他的精神会在那些有足够势力说强权即公理的人的心中徘徊良久

“对于人类和人道而言，一个理解的精神是常在的。用武力取得的只算是取得了一半；用论据获得的才能永远获得。”

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为弥补一项疏忽所作的来迟了的努力。作为一个受过英国教育的人，我要说“事后聪明”这句话是多么富于英国味道。

主席：谢谢毛里求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午七时四十分散会。